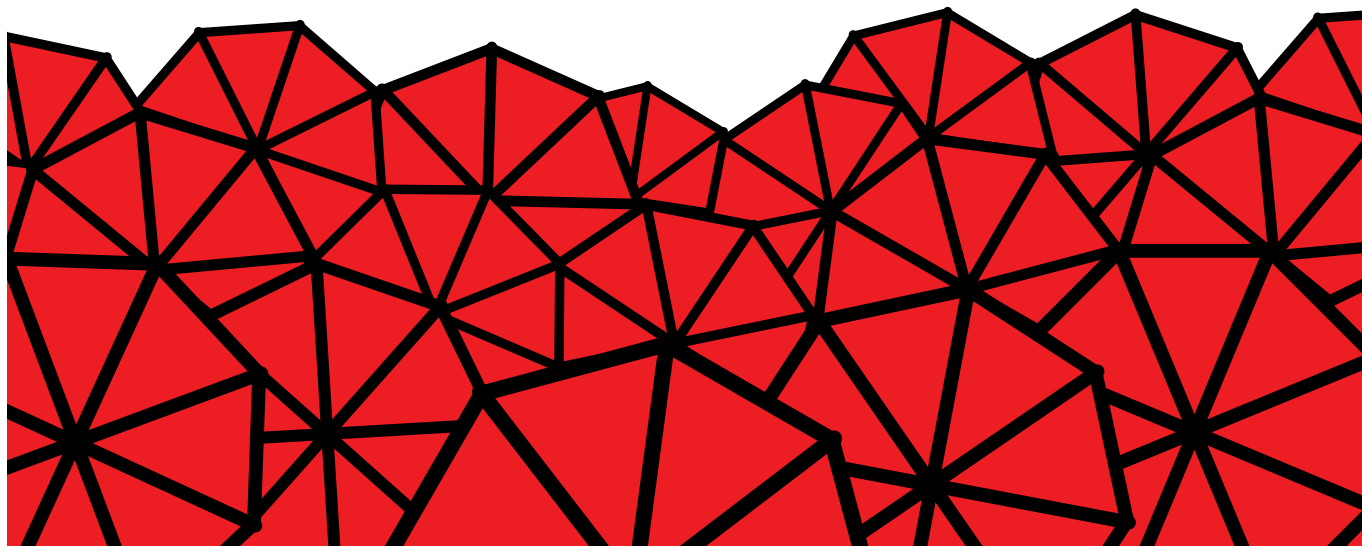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简报 反人权运动
对性工作者的
影响



反人权运动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介绍

近年来，组织起来反对边缘群体和被刑事定罪群体权利的运动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影响不断增长。反移民权利团体游说采取更严格的边境政策，侵犯了迁徙和移民的权利。反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 (SRHR) 和反性少数团体阻碍了女性、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人群获得性与生殖

反人权运动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新兴的联盟，他们对性工作者构成许多威胁。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威胁，以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

健康服务以及性别确定护理的机会，侵犯了健康权。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持续攻击性工作者的身体自主权和人权，此外，性工作者还受到其他反权利运动的攻击，因为他们同时还具有移民，妇女，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性少数，跨性别和性别多元，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毒感染者等身份。反人权运动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新兴的联盟，他们对性工作者构成许多威胁。必须更好地理解这些威胁，以促进性工作者的权利。

本简报概述了反人权运动使用的主要策略，并强调了它们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影响。简报还探讨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如何挑战反权利运动，包括他们克服障碍的策略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功。最后，简报对尊重和保护性工作者人权提出了建议。

方法论

简报基于2022年5-6月在八个国家进行的深入研究完成，包括与NSWP成员组织进行的全球电子咨询，以及对在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毒品使用者的权利、妇女权利、移民权利、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以及性少数和性别多样化人群的权利等领域的主要线人进行的访谈，并用桌面文献综述作为补充。国家顾问使用标准化问卷进行了访谈和焦点小组，并制作了关于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莱索托、北马其顿和西班牙的国家案例研究。使用类似的问卷对NSWP成员组织进行全球电子咨询，获得12个NSWP成员组织的回复。总共有275名性工作者参加了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其中包括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作者、移民性工作者、性少数性工作者和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参与者代表了各种性别认同，包括顺性别和跨性别女性和男性，非二元和性别流动。参与者在不同的室内和室外环境中工作。

反权利运动背景及交叉性

“反权利”一词在过去十年中在民间社会的话语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使用。2019年CIVICUS的一份报告将“反人权团体”定义为在民间社会空间中运作以推动限制一项或多项人权的组织。¹ 这些团体已逐步渗透到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 (NGO) 以及一些政府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保守的, 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等。一些反人权团体虚伪地用支持人权的语言来构建他们的倡导, 例如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 他们打着“保护”妇女的幌子否认和破坏性工作者以及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群体的人权。

影响性工作者的一些最突出的反权利团体是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 他们将所有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混为一谈。这些运动是从早期的女权主义演变而来的, 这些女权主义试图将白人基督教的“适当”性行为规范强加给权力和地位较低的妇女, 特别是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和移民。这些女权主义者经常推广“北欧”或“终止需求”模式, 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事定罪, 目的是“结束剥削”和废除性产业。² 全球反性工作废娼主义与北美结束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运动不同, 后者主张反对监狱和治安作为历史奴隶制的延伸。本简报专指以“性别平等”的名义寻求根除性工作的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往往是更大的反性别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反性别运动包括“性别批判”和排斥跨性别的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联盟, 他们主张“生理性别”比性别认同更重要, 还有政治保守派以及倡导反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再加上性工作者权利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反性别运动起源于1990年代天主教会内部的讨论, 挑战联合国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ICPD) 和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承认。从那时起, 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跨领域的反权利运动, 在北美和欧洲都有据点。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影响力, 使这种意识形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³

其他反权利团体和运动有各种重点, 包括反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反对间性人和残疾人的生育自主权, 以及更普遍的性教育、避孕和堕胎; 反对移民反对跨境自由流动, 特别是针对在目的地国属于少数种族、族裔或宗教群体的移民; 反对公民权利和正义的反民主立场, 尤其是针对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反对。这些反权利团体越来越多地联合起来, 在各种运动和意识形态中结盟, 以多种方式威胁和影响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作为工人受到影响, 无法自由结社和组织, 无法享有其他基本劳动权利, 也无法享有隐私和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性工作者也因为其交叉身份受到影响, 如妇女, 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人群, 以及寻求获得医疗保健的间性人, 希望跨境流动的移民, 还有试图行使其公民权利的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 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身份, 如宗教和少数民族, 性少数, 残疾人, 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毒品使用者。

1 CIVICUS, 2019, 《逆流进击: 民间社会对反人权团体的回应》。

2 Elene Lam 和 Annalee Lepp, 《蝴蝶: 抵制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危害, 培育加拿大的同伴组织》, 反人口贩运评论, 12 (2019): 91-107。

3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 2021, 《面临风险的权利: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趋势普遍性观察报告》, 55。

这些运动是从早期的女权主义演变而来的, 这些女权主义试图将白人基督教的“适当”性行为规范强加给权力和地位较低的妇女, 特别是黑人, 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和移民。

反权利战术及其影响

危险联盟

宗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反性别运动中的废娼主义团体和反性别工作者权利运动之间的联盟，使这些行动者能够扩大影响力，发展和巩固资金，并使有害政策合法化。虽然其中一些群体可能在堕胎，避孕药具可及性和同性恋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往往在反对性工作，跨性别和性别多元身份以及边缘种族和宗教群体的立场上团结一致。

“通常，在德国支持北欧模式的‘女权主义团体’也相信跨性别权利是对女性的威胁，例如，对穆斯林妇女及其通过戴头巾表达信仰的权利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因为她们将其描述为压迫妇女。”

神女协会，德国

一些民间社会利益相关方认为，尽管存在一些意识形态差异，但从本质上讲，反性别和反性工作团体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联盟并非如表现得那样稳定，尤其是在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建立联盟时。当他们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盟友推动立法反对生育权，他们会指责跨性别者损害了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些矛盾融入他们的世界观中。”

ANDREW SPIELDENNER, MPACT男同性恋健康与权利全球行动执行主任

萨尔瓦多，北马其顿和西班牙的参与者观察到，原教旨女权主义和保守宗教联盟对性工作者，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以及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在萨尔瓦多，跨性别者和性工作者由于这些联盟推动的反人权言论而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在北马其顿，一个由民间社会组织、政党、宗教团体等组成的反权利联盟已经成立，以协调和扩散社交媒体上的反性工作、反性少数、反跨性别和反毒品使用者的言论。这个联盟中的团体不仅相互交叉引用，而且从国际反权利活动者那里借用和改编材料，以适应当地情况。

随着反人权活动者不断联合起来，他们的声音、影响力和合法性都在增长，对性工作者和其他被刑事定罪和边缘化的群体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反人权联盟在渗透到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时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反人权联盟在渗透到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时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在西班牙，在西班牙原教旨主义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以及从事性别暴力领域的主流女权主义团体的敦促下，政府推出了针对性产业的更加压制性的法律。这些团体现在正在从瑞典政府获得资金，后者在推动将性工作者的嫖客刑事定罪。因此这些团体被禁止支持性工作免除定罪和性工作者的劳动权利。

“与极右翼团体互动的天主教团体，与女权主义运动合流，产生对性工作者的仇恨言论。”

-女性性工作者，西班牙

反人口贩运和反移民政策

许多反权利的叙事和政策都与反人口贩运运动联结在一起，因为他们广泛将性工作和移民与贩运和剥削混淆。纵观历史，反人口贩运的立法和话语一直将“卖淫”作为控制妇女运动、移民和性行为的手段。反人口贩运运动及其政策也植根于围绕“白人奴隶制”的历史恐慌，助长了种族化的刻板印象。

…反人口贩运运动继续呼吁限制运动和对种族和族裔进行侧写。

今日，反人口贩运运动继续呼吁限制运动和对种族和族裔进行侧写。通过将性工作与人口贩运和剥削混为一谈，反人口贩运组织能够为加强边境警务以及对性工作者工作场所的暴力“突袭和救援”行动辩护。⁴ 作为移民的性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在目的地国家是少数民族或民族的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因此，许多反性工作和反移民的议程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⁵

“政府利用反性工作运动来支持反移民议程，通过关闭“后门”选项来限制移民妇女移民的机会，同时不扩大能保护试图合法移民的流动性工作者的条款。”

—维多利亚同伴资源协会，加拿大

为了推动更广泛的反人权议程，限制移民并将性工作定为刑事犯罪，导致迁徙性工作者的人权往往被忽视。在许多性工作合法化的国家，移民被明确禁止从事性工作。即使在第一个将性工作完全免除定罪的国家新西兰，任何来该国或持临时签证居住在那里的人如果从事性工作或经营妓院，都可能被取消签证，面临被驱逐出境。⁶ 尽管全球流动性呈上升趋势，但迁徙性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受害者或罪犯。

“总的来说，移民作为一个问题在欧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与那些没有受到更多右翼紧缩深刻影响的决策者进行对话变得更加困难。有大量的立法和拟议的立法推动增加拘留和驱逐出境，这也将限制进入居留程序。这些影响所有移民，特别是不稳定和无证移民，因此对迁徙性工作者有特殊影响。”

LILANA KEITH, 高级倡导官员，无证移民国际合作平台 (PICUM)

“终止需求”模式

在影响政府制定旨在通过废除性工作来消除人口贩运的政策方面，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也非常成功。最值得注意的是，将买性而不是贩性定为犯罪的“北欧”或“终止需求”模式持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关注。自1999年在瑞典推出“终止需求”政策以来，挪威、冰岛、加拿大、北爱尔兰、法国、爱尔兰和以色列都采用了“终止需求”政策，阿根廷、斐济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在考虑。2019年，瑞典和法国政府还承诺合作，将这一反性工作政策输出到世界各地，作为其“女权主义”外交政策议程的一部分。⁷

“终止需求”模式植根于原教旨女权主义观念，即所有性工作者都是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性工作是对女性的暴力。因此，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终止需求”模式只会加剧性产业中的剥削和暴力，它被宣传为加强两性平等和打击剥削的一项措施。⁸ 尽管性工作者本身并没有被定罪，“终止需求”模式导致执法部门、嫖客和冒充嫖客的人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增加；增加管理中的权力滥用；导致性工作者的不良健康结果；并导致性工作者被驱赶、驱逐出境、监禁并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⁹

4 NSWP, 2021年,《简报: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后果》

5 NSWP, 2019年,《反人口贩运立法和倡议对性工作者的影响》

6 NSWP, 2018,《迁徙性工作者》

7 外交部,瑞典政府办公室,2019年,《法国外交部和瑞典外交部的联合声明》

8 大赦国际,2022年,《我们生活在一个暴力体系中:爱尔兰针对性工作者的结构性暴力》

9 NSWP, 2015, 宣传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正影响

反权利运动用“保护”的“支持权利”语言掩盖歧视和偏见，在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中传播错误信息，进而使有害做法和政策永久化，并加剧耻辱和歧视。

伤害性叙事和仇恨言论

反人权活动者经常声称他们认为脆弱的人群寻求“保护”，包括妇女、性工作者、难民和儿童，同时限制他们的权利，加剧耻辱和歧视。“终止需求”模式和反人口贩运措施都是由“保护弱势群体”的误导性言论驱动的。反权利运动用“保护”的“支持权利”语言掩盖歧视和偏见，在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中传播错误信息，进而使有害做法和政策永久化，并加剧耻辱和歧视。反人权运动声称采用这种叙事不仅是为了促进旨在“保护”性工作者免受侵害的政策，而且还要“保护”普通民众免受他们认为是危险、不道德或异端者的伤害。后一种叙事在反性别运动中特别强烈，该运动将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人描绘成掠夺者和变态，侵犯顺性别妇女的权利，并在道德上腐蚀儿童。这些反性别活动者同时努力使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倡导失去合法性，并压制性工作者的声音，使跨性别性工作者受到更大的攻击。

“脸书充斥着（来自一个反性别团体对我们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抗议）的负面言论，以儿童为掩护。他们知道这会激发对话，公众将“提高声音”，反对他们的孩子看到红灯区橱窗里的妓女。”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北马其顿

反人权运动所宣扬的叙事，即使以“保护”为框架，也往往伴随着或煽动仇恨言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元首也与反人权运动结盟，传播有关性工作者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有害信息。萨尔瓦多参与者指出，针对性工作者的杀害妇女和杀害跨性别妇女事件有所增加，这可能与Nayib Bukele总统传播的仇恨言论有关。该人被指控促进人权侵犯。

“如今，组织起来是危险的，因为Nayib Bukele总统一直在线社交媒体上把我们描述为违法者，而普通民众则用他的话语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性工作者，萨尔瓦多

反权利公共卫生政策

“保护”的反权利言论也被用来促进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与基于证据和权利的预防疾病传播、疾病和死亡的做法相矛盾。将性工作、毒品使用、同性关系和性别多元身份刑事定罪加剧了有伤害性影响的公共卫生政策，如将艾滋病毒暴露、不披露和传播形式定罪。这种政策是由错误刻板印象所推动的，即认为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是“疾病媒介”。

自COVID-19在国际上爆发以来，许多政府以“保护公众健康”为幌子，扩大了对性工作者的惩罚性政策和做法。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性工作者的人权，使他们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暴力和刑事定罪，同时减少了他们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并将他们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外。当局声称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保护公众免受性工作者侵害。性工作者被毫无根据地指责为COVID-19的“超级传播者”。¹⁰

10 NSWP, 2021年, COVID-19与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主导的组织

“在COVID-19封锁限制期间，警察袭击了许多夜间在街上看到的人，但女性性工作者还遭到强奸，而其他女性和男性则只是被赶走。”

关键受影响人群联盟 (KAPAL), 莱索托

反权利运动也影响了性工作者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 (SRHR)，因为该运动反对促进避孕，安全堕胎，性别确定护理和其他基于权利的性健康服务的可及。虽然性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得负担得起的、适当的和高质量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服务，但近年来，反权利运动加大了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削弱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工作。在过去十年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严格限制或废除堕胎权的立法。一些反人权行为者还试图通过错误地将避孕药具与堕胎混为一谈来限制

…这些反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活动者将其立场描述为“反堕胎”和“支持性别平等”，而事实上，他们正在破坏人发会议 (ICPD)《行动纲领》所提出的权利，即个人的身体自主权和在不受歧视、胁迫和暴力的情况下做出生育决策 (如生育) 的权利。

获得避孕药具的机会。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反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活动者将其立场描述为“反堕胎”和“支持性别平等”，而事实上，他们正在破坏人发会议 (ICPD)《行动纲领》所提出的权利，即个人的身体自主权和在不受歧视、胁迫和暴力的情况下做出生育决策 (如生育) 的权利。¹¹

同时，许多反权利运动，特别是那些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试图限制学校的全面性教育，这进一步违反了ICPD的《行动纲领》。性工作者经常担负了教育客人安全性行为的任务，他们已经提出社群需要更多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项目。¹² 越来越多的人

在没有接受过全面的性教育的情况下长大成人，这将继续对性工作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行动是更广泛的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全球攻击的一部分，该攻击对所有顺性别妇女以及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人都有负面影响。然而，取消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保护将过度影响性工作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性少数。此外，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服务可及性减少对性工作者尤其有害，因为刑事定罪、污名和歧视等结构性障碍持续存在，增加了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和性传播感染及暴力的脆弱性。¹³

性别不平等和恐跨性别

所有性别的性工作者都受到反性别运动及其叙事的负面影响。在将性工作作为对顺性别女性的“父权压迫”形式进行反对的同时，反权利运动还破坏了妇女的权利和自主权，使那些认为自己是男性，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的性别身份不可见和无效。由于废娼主义者反人口贩运倡议和“终止需求”模式，女性性工作者受到警方针对、“突袭和救援”行动以及胁迫性的“退出”和“康复”计划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些都侵犯了她们的人权。¹⁴ 与此同时，来自原教旨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团体对“保护”和“拯救”妇女免受贩运和剥削的推动，紧跟反性别叙事的趋势。这些叙事将顺性别女性描绘成“跨性别议程”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怪不得许多参与反性工作的人同时反性别，特别是反跨性别多元。

11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4年，1994年9月5日至13日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方案：20周年纪念版，7.3。

12 NSWP，2018年，性工作者获得全面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能力

13 Lucy Platt等，性工作法律与性工作者健康之间的关联：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PLOS Medicine 15 (12) (2018)。

14 NSWP，2018，“‘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这种辩护巧妙地与跨性别者作为欺骗性“掠夺者”的反性别叙事相一致，从而使肇事者能够对跨性别性工作者实施暴力而不受惩罚。

在全球范围内，反性别运动借鉴了将跨性别女性描绘成骚扰顺性别女性并入侵其安全空间的危险和骗子的叙事。因此，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不仅因为社会各界普遍存在的恐跨性别而面临过度的污名、歧视和暴力，而且还面临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攻击，被标签为掠夺者，“偷窥者”或伪装的嫖客。¹⁵

通过将恐跨性别的言论置于妇女权利框架内，反性别运动已经接纳并延续了暴力，以及有害的政策和做法，这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具有特别毁灭性的后果。此类做法的例子包括“性少数恐慌辩护”法律策略，该策略允许对性少数人群犯罪的肇事者通过声称他们正在

“保护”自己免受不必要的性侵犯来消除或减少他们的刑期。例如，声称他们不知道受害者是跨性别者。通过声称受害者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引起了恐惧或“恐慌”，从而导致暴力，肇事者试图以“自卫”为名减少或消除他们的刑期。这种辩护巧妙地与跨性别者作为欺骗性“掠夺者”的反性别叙事相一致，从而使肇事者能够对跨性别性工作者

实施暴力而不受惩罚。反性别运动推动的其他反跨性别政策包括针对反歧视法，法律性别承认和性别确定医疗保健的政策，都会影响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

自2009年以来，跨性别欧洲的“全球尊重跨性别与恐跨性别”(TnT)项目收集了全球范围内针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人群谋杀案的报告数据。2021年，TnT记录了自项目启动以来创纪录的谋杀案数量，其中96%的受害者是跨性别女性。在已知职业的受害者中，58%是性工作者。¹⁶ 跨性别性工作者所遭受的暴力的严重性很难被完全获知，因为担心法律后果和进一步的恐跨性别反应，许多跨性别性工作者没有报告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此外，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受害者在警方报告中经常被错误地对待。¹⁷

跨性别和性别多元的性工作者往往因其职业、性别身份和性取向而面临多种形式的刑事定罪，他们成为执法部门的目标的频率过高，并被监禁在与其性别认同不符的单一性别设施中。被监禁的跨性别者被发现遭受高度的暴力、虐待和心理困扰，并且习惯性地被剥夺在监狱和封闭环境中获得性别确定医疗护理的机会。反性别运动一直在大力宣传，试图阻止跨性别女性被关押在女性监狱中，将她们描绘成暴力的性掠夺者。因此，跨性别性工作者特别容易被监禁，以及在监狱和封闭环境中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和虐待。¹⁸

对组织和倡导性工作者权利的影响

反权利运动还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的组织和倡导。然而，由于反权利运动使用支持权利的语言和框架的策略，以及他们将自己置于妇女运动之中，他们在政府和多边空间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影响可能难以识别。

由于“反权利运动”的概念仍然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它在整个性工作者社群中的理解并不统一，这使得性工作者在倡导和政策制定层面挑战反权利叙事更困难。许多参加这次咨询的性工作者对本国的(反人权运动)的构成表达了不同的概念。人们更容易识别个人权利侵犯者(如执法人员、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的宗教政治领袖)，而不是一场运动。

15 NSW, 2021年, 关于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错误信息的后果

16 跨性别欧洲, 2021年, 欧洲和中亚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跨性别者的生命: TDOR 2021政策简报

17 NSW, 2018年, 性少数性工作者所经历的恐惧和恐跨性别

1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世卫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刑法改革国际, 2022年, 技术简报: 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的跨性别者和艾滋病毒问题

“我不知道（反人权团体）叫什么，但我知道警察和那些允许像我这样的人有这样待遇的人，是有责任的”。

—移民性工作者，西班牙

性工作者习惯性地被排除在大部分妇女运动的有效参与之外，而那些确实进入妇女运动空间的人经常受到声称促进妇女权利和赋权的反权利行为者的口头，情感甚至身体虐待。

对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性工作者领袖及其盟友来说，由于反人权运动的存在，许多国家和国际倡导和决策平台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敌对和排斥的空间。由于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和废娼主义团体所信奉的反性工作意识形态的盛行，妇女运动空间带来了挑战。性工作者习惯性地被排除在大部分妇女运动的有效参与之外，而那些确实进入妇女运动空间的人经常受到声称促进妇女权利和赋权的反权利行为者的口头，情感甚至身体虐待。虽然这些恐吓策略并没有阻止性工作者继续在妇女运动空间中参与和发声，但它们使性工作者的声音更难被听到。¹⁹

反权利组织正在从保守的资助者和私人捐助者、宗教团体、企业和国家机构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²⁰，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仍然资金严重不足，往往被排除在国内和多边资助机制之外。这反过来又限制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有效挑战反人权运动及其叙事的资源和能力。

“我们的组织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再从国家获得援助或资金。我们被认为是一个鼓励女孩和某些女性从事性工作的团体。”

ASSC 非政府组织，安哥拉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资金不足，加上反人权行为者的长期攻击和暴力，都加速了性工作者领导人的倦怠和创伤频率。面临相互交织的污名和歧视形式的性工作者往往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影响。

“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的人是第一批遭遇歧视的，如果你是性工作者，那是另一层歧视，如果你是黑人跨性别性工作者，那是另一回事，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生命。不得不应对我们遇到的那种程度的暴力，我认为这已经让很多活动家筋疲力尽。我们带着很多创伤工作。”

DENNIS VAN WANROOI, 顾问项目经理，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性特征，ILGA世界

反人权团体不仅攻击性工作者，还试图诋毁人权捍卫者和其他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利益相关方。大赦国际在2016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支持性工作完全免除定罪²¹，一直是由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废娼主义团体，宗教领袖和名流支持的反性工作攻击的突出目标。反人权组织还试图通过伪称他们正在促进“青少年卖淫”或违反国际人权框架来诋毁联合国中支持性工作权利的负责人。例如，2020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卫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Tlaleng Mofokeng博士遭到网络攻击，试图诋毁她的专业知识，因为她倡导性工作者的人权，并公开支持性工作免除定罪。²² 虽然对反弹的担忧并没有完全阻止外部利益相关者公开支持性工作者的权利，但它们在一些组织和机构内部引起了抵制。这些组织和机构担心失去一些可能与反权利运动结盟的捐赠者，盟友或成员。

19 NSWP, 2021,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运动](#)

20 妇女发展权利协会, 2021, [《面临风险的权利: 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趋势普遍性观察报告》](#)

21 大赦国际, 2016年, [大赦国际关于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性工作者人权的政策](#)

22 NSWP, 2020, [关于错误信息的简报](#)

性工作者主导的对反权利运动的抵抗

对“反权利运动”的认识仍在增长。几十年来，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直从事挑战反人权团体和叙事的倡导活动。“性工作”一词本身最初是由性工作者活动家Carol Leigh在1970年代后期的一次反色情妇女会议上创造的，作为强调妇女能动性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对她们的物化。²³ 从那时起，性工作者权利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有效地挑战各种反人权行为者和团体。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用来对抗反权利运动的影响力和影响的关键策略之一是建立联盟。从地方到全球层面，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关注妇女权利、性少数权利、移民权利、关键人群权利、艾滋病毒感染者权利以及更广泛人权的各种团体和组织合作，以扩大他们的声音和倡导。由于反人权运动的有害影响很少只影响一个单一的人群，联盟建设提供了一种宝贵的交叉方法，统一倡导信息和挑战共同的压迫。

“所有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之间的联盟以及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产生的主要成就是运动的统一：现在这些组织更加强大，因为他们以统一的声音说话并分享倡导信息。”

性工作者协会，9月21日，厄瓜多尔

建立跨运动联盟也是一项基本战略，应对反权利运动在国家和国际倡导和决策平台中特别是在妇女权利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这些联盟不仅支持性工作者进入传统上充满敌意和排斥性的空间，而且有助于在

建立跨运动联盟也是一项基本战略，应对反权利运动在国家和国际倡导和决策平台中特别是在妇女权利领域日益扩大的影响。

主流妇女运动中建立对性工作者权利的更广泛支持。2018年启动的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主义联盟(SWIFA)一直是NSWP在妇女运动中建立全球联盟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SWIFA由七名核心成员组成²⁴，致力于倡导整个联合国系统对性工作权利的肯定立场，支持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联合国公约机构和特别程序的接触，并促进参与妇女运动

空间。²⁵ NSWP成员反映，与志同道合的女权主义组织和政策制定者建立联系，加强了他们在国家层面抵制和挑战反人权运动的能力。

“我们得到了来自不同非主流女权主义组织的越来越多的支持。(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政治家网络的支持，他们倾听我们的意见，并试图与我们一起寻找回旋余地，并[找到]足够‘可接受’的免除定罪的论点。”

斯特拉斯堡圣但尼妇女合作，法国

在几十年的性工作者倡导中学到的一个关键教训是，试图改变强硬的反人权团体的立场很少是有成效的。相反，事实证明，专注于改变“可移动中间派”活动者和组织的立场往往更有效。争取那些不持有反对性工作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或者那些愿意倾听性工作者并从基于权利的角度考虑性工作者的生活经历的人。通过建立联盟，扩大性工作者的声音，提高对性工作者生活经历的认识，以及通过提供挑战错误信息的证据，争取中间派是可以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性工作者应该避免直接与反权利活动者接触，而是说这些接触必须以战略性的有分寸的方式进行。

“(一个)策略是呼吁激进女权主义代表进行讨论。这个讨论不是针对激进女权主义者本身，而是针对那些将读到讨论的人。”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俄罗斯

随著反权利运动的策略不断转变和发展，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监控发展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目标仍然很重要。

23 NSWP, 2021年,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运动

24 SWIFA包括非洲妇女发展与交流网络(FEMNET), 大赦国际, 为赋权行动创造资源(CREA), 全球反对贩运妇女联盟(GAATW),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亚太(IWRAW-AP)和妇女生育权利全球网络(WGNRR)。

25 NSWP, 2021年, 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参与妇女运动

建议

以下建议是根据与NSWP成员组织咨询的结果提出的，旨在应对反权利运动对性工作者的负面影响。

- **性工作全面免除定罪。**性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其销售、广告、购买和第三方参与，都必须免除定罪，以实现性工作者的人权。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可以动员和倡导反对反人权团体，而不必担心法律后果。将性工作刑事定罪也使反人权活动者对性工作者犯下的有害政策和做法永久化。
- **识别反权利运动的战术，并制定策略应对。**对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及其盟友来说，要有效地挑战反人权运动所宣扬的有害叙事和政策，就必须了解反人权团体使用的战术。不仅在性工作者社群，而且在更广泛的公众中，都应该提高对反权利运动战略和议程的认识。
- **增加对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资助。**许多参与者指出，资金不足是抵制和挑战反权利运动的主要障碍。由于刑事定罪、污名和歧视，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仍然严重资金不足，而对反人权团体的资助继续增长。
- **加强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与其他人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跨运动联盟。**必须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在妇女权利、性别平等、移民权利、性少数权利、艾滋病毒、种族平等、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关键人群和其他边缘群体的权利等领域工作的盟友之间促进和加强联盟。这些联盟鼓励采取一种交叉的、基于权利的途径，以放大声音，提高知名度，并促进进入关键的倡导和决策空间。
- **促进性工作者被有效纳入所有与他们有关的讨论、政策和平台。**随着反人权团体继续渗透并主导许多倡导和政策制定空间，确保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被有效纳入这些空间从未如此重要。通过这种方式，性工作者可以继续提高人们对反人权运动对其社群的有害影响的认识，同时促进基于权利的政策和做法。

结论

性工作者过度受到反权利运动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影响。她们作为性工作者的权利受到侵犯，她们作为妇女、跨性别者和性别多元的人、移民、种族和少数民族、性少数社群成员、毒品使用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等身份受到侵犯。性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终极交叉问题。

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必须获得适当的资源，以提高社群内对反权利运动及其战术的认识，同时加强自己与其他支持权利运动的战略联盟。

随着反人权运动继续通过建立联盟、渗透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以及挪用支持权利的语言来促进有害的政策和做法，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将继续受到这种影响。因此，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必须获得适当的资源，以提高社群内对反权利运动

及其战术的认识，同时加强自己与其他支持权利运动的战略联盟。将性工作全面免除定罪将提高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挑战反人权运动的能力，并直接废除他们推广的许多有害政策和做法。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致力于保障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领导机构的底层声音能够被听到。简报记录了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所面临的问题, 这些简报也会试图分析全球趋势。

“性工作者”一词反映了性工作者社群内部巨大的多样性, 包括但不限于: 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工作者; 异性恋男性性工作者; 感染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工作; 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 年轻的成年性工作者 (年龄在18-29岁之间); 有证件和没有证件的流动性工作者, 以及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性工作者; 残障性工作者; 以及被拘留或监禁的性工作者。



Mitchell House, 5/5 Mitchell Street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7BD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 SC349355

项目支持:

